

她多想，多想出去吃碗面

本报记者黄海波
编辑刘亮

1月23日，丁海艳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时，只剩下1小时20分钟的出城时间了。

这个中南民族大学的大二女生有些心慌意乱，不知所措。在宿舍里焦虑了一阵，最后还是决定赶紧出城，再转车回甘肃老家。

她匆忙收拾行李，没想到越忙越乱，偏偏这个时候，身份证死活找不到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在郁闷和无奈的沮丧之中，所有的离汉通道都关闭了。她只能留在武汉。

她和另外100多位没有回家的学生一起，在学校宿舍里，开始了漫长的封闭生活。

今年21岁的丁海艳，是甘肃天水人。父母都是农民，弟弟和妹妹还在上高中。

“我是家里的老大，想着多分担一点。”小丁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，“其实也不想太早回家，不知道和爸妈说些什么。”

为了给家里减轻一些经济压力，大一时她就利用课余时间，去商场做导购，去超市收账。

1月23日，也是她在超市收账的最后一天。打算拿到2000多元兼职酬劳后，踏踏实实回家过年。

早上起床后，她发现老板在兼职工作群里留言，坐公交车上班的同学，今天起不用再来了。她还纳闷，再翻翻手机，才知道武汉封城了。

找身份证的时候，小丁还在怀疑自己会不会已经被感染了？这些天坐公交车上班途中，接触过那么多人，还有在超市收账期间，那么多不戴口罩的人进进出出……她害怕一个人在武汉，但更害怕把病毒带回老家。

2月3日，学校对这些留校学生实行封闭管理，免费提供三餐。虽然都是盒饭，但是学校非常用心，经常更换菜谱。

对小丁这个西北人来说，吃不到面食是痛苦的事情。她和同学聊天，谈到解封之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吃面，吃辣辣的火锅……

这栋偌大的女生宿舍楼，一共住了5位女生。大家分散住在自己的宿舍，宿管阿姨张罗建了一个微信群。

宿管阿姨短发，身材微胖，戴上口罩之后眼睛显得挺大。每次餐来了，她都会在群里招呼，“美女们，吃饭啦！”

“阿姨平时挺和蔼，有时也会有脾气。有次她在群里叫大家领餐，有人却迟迟不出现，她就在楼道里用武汉话吼，‘死丫头，怎么还不出来？’”丁海艳笑着说。

学校特意规定，留校学生在领餐之前，做一段广播体操。小丁这栋楼，由这位宿管负责拍摄视频，然后传给学校。大家私下讨论，校长是不是怕大家吃太胖？

刚开始做操时还比较有序，5位女生排成一队，整齐划一地做几个八拍。到了后来，大伙儿起床时间不一，领餐时间不一，集体操慢慢变成了单人操，搞得宿管有些无奈。

校园网是开放的。从2月中旬开始，也有了网课。除此之外，这些留校生最主要的活动空间，就是宿舍。

在这段时间，一本300多页的六级英语词汇书，已经被小丁“啃”下了一大半，英语听力也有所进步。她还准备参加豆瓣上的长篇小說接力赛，正在构思故事梗概。实在无聊的时候，就在宿舍里跳几下。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。

长时间的封闭，还是让不少学生有些烦躁。在留校学生的微信大群里，有人抱怨饭菜不合口，有人对收不到快递不满，有人甚至因看法不同而争执不下……

小丁自称有些高冷，在父母眼里不是特别贴心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感觉和他们有了距离。

高中毕业时，父母让她报考省内的高校，小丁偏执拗地要到省外上学，最后考取了中南民族大学。

“我在朋友面前话还比较多，在父母面前话就少。尤其和我爸，经常说不了几句，他可能就会训我，而我又比较‘轴’。”小丁笑了笑。

疫情下的分离，让彼此多了一份关切。两个多月前，她还不打算早回家，怕和父母没有太多话题。现在，一个人在宿舍闷太久，特别羡慕离开武汉的同学，能有这么多天和家人待在一起。

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，给女儿打视频电话的次数，明显多了起来。“话不投机”的父亲，经常在小丁和母亲视频时，来回绕着出现在镜头中。

“有一次我妈和我说完话，扭头就问我爸，还有没有要说的？见我立刻闪到镜头外，干脆地说‘没有’。”小丁说，那一刻，她其实知道父亲很想和她聊两句。

不过，当有一次母亲在视频中突然问女儿，“你有没有想过我们？”

“我就在镜头前傻笑，说出那个字挺难的。”小丁说。

随着武汉解封之日逐渐临近，学校也提前发了通知，首先对同学们的坚守和支持表示最真诚的感谢。

从4月8日起，学校不再免费送餐，大家可以离开宿舍，但只能在校园里活动。申请回家的同学，必须先行了解当地疫情防控政策，再向辅导员申请。

父母前段时间向村支书打听了一下，被告知现在回家还要到县城酒店集中隔离14天，每天费用300多元。

小丁想了一下告诉他们，自己舍不得花这笔钱，决定继续在学校待一段时间。



▲4月5日，人们在武汉市吉庆街的“大排档”雕塑旁吃热干面。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

武汉：重启“熟悉的生活”还有多远

本报记者刘梦妮 | 编辑刘亮

在普通武汉人心中，与1月23日封城的巨大心理冲击相比，4月8日解封意味着什么？武汉人都期待这一天，“解封了，我就可以自由来去了”，市民吕晓宇说。

市民杨晓一直盼着4月8日，“到了这一天，我离正常生活就更近了。人们出门上班，周末可以踏青，快递有人送，楼下菜市场开门……真希望这样的生活早点回来。”

而在市民夏宇琪眼里，这个日子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：“它既不能标志武汉疫情彻底结束，也不会让我放心大胆地走出家门。”

无论如何看待这个日子，重新回归正常生活，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。

疫情形势好转，“重启键”已经按下。生活在武汉的人们，此刻的生活和心态怎样？真正回到正常的生活，还有多远的路要走？

“很多隔离点都已经撤销，我也快回家了”

3月28日，已经吃过早饭的石虎虎，发现楼下的热干面店营业了。

“两个多月没吃热干面了，特别想！”石虎虎一边等着热干面打包，一边在小区业主群里“放毒”——发布这家店重新开张的消息。一下子，群里跟抢红包一样热闹起来。竟然有人穿着拖鞋冲下楼，直奔热干面店而来。

石虎虎说，武汉的烟火气儿，就是从吃上开始的。

“现在叫外卖容易多了，叫上一份鸭脖鸭爪啃，幸福感简直爆棚。”说起封闭在家的日子，杨晓印象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，都跟吃有关。

疫情暴发不久，鲁仲珠就跑到隔离点做志愿者，一干就是两个月。门口的马路上，汽车和行人不断增多，寓意着武汉正在一天天苏醒。

“现在叫外卖容易多了，叫上一份鸭脖鸭爪啃，幸福感简直爆棚。”说起封闭在家的日子，杨晓印象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，都跟吃有关。

疫情暴发不久，鲁仲珠就跑到隔离点做志愿者，一干就是两个月。门口的马路上，汽车和行人不断增多，寓意着武汉正在一天天苏醒。

“现在叫外卖容易多了，叫上一份鸭脖鸭爪啃，幸福感简直爆棚。”说起封闭在家的日子，杨晓印象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，都跟吃有关。

疫情暴发不久，鲁仲珠就跑到隔离点做志愿者，一干就是两个月。门口的马路上，汽车和行人不断增多，寓意着武汉正在一天天苏醒。

“现在叫外卖容易多了，叫上一份鸭脖鸭爪啃，幸福感简直爆棚。”说起封闭在家的日子，杨晓印象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，都跟吃有关。

疫情暴发不久，鲁仲珠就跑到隔离点做志愿者，一干就是两个月。门口的马路上，汽车和行人不断增多，寓意着武汉正在一天天苏醒。

出示健康绿码和复工证明。那些没有复工证明的市民，一般只能两三天出去一趟，购买生活必需品。

杨晓已经在家待了两个多月，“都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。不过，有时又会感觉特别压抑。”

这些日子，她在朋友圈里一看到外地朋友出门踏春，心里就不是滋味。

杨晓还不敢随便出门——她在网上看到，有人去逛了趟超市，或者坐了趟地铁，健康绿码就变红了，需要再隔离14天。

杨晓所说的“健康绿码变红”，指的是在一段时间同一地点待过的人，通过扫码被记录在大数据中，如果有谁检测出新冠阳性，其他人的绿码也会随之变红。

“病毒本身很可怕，为了避免这种麻烦事，上半年肯定不去逛商场。”她说。

扫码方便了管理，但也带来种种不便。4月6日，苏一在外面看见，由于一人一码乘车，一位母亲带着孩子，却只有一个手机，最后母子二人都没坐上这趟车。

还有一次，一位大叔手机运行慢，怎么都扫不上码，公交车等了他两三分钟后，只好开走了。

“这类事情，每天都会发生在武汉的公交站点发生。”苏一说。

虽说武汉整体形势在好转，张义仍不乐观，“毕竟还有那么多无症状感染者，我心里没底”。即便偶尔去超市购物，他都会挑人最少的午饭或晚饭时间去。

3月31日，邱沙去楚河汉街的商场购买春装，只有三分之一的店铺开张。邱沙回忆，那天逛街的人明显比平时少，他买好看中的衣服后，迅速离开了。

张星星的家在武汉市江夏区农村，父母在自家一楼开了一间小卖部。疫情最严重时，家里大门紧闭，邻居敲门买东西都不敢，生怕被感染。

“那时菜不好买，我们家吃了好久的腊肉腊鱼。”这是张星星记忆中，“腊味”吃得最多的一个春节。目前，新鲜蔬菜水果可以通过电商下单，平时也敢开门窗通风，让阳光照进来。小卖部也重新开张，只是门口放了长凳，顾客不再进屋选购。

即便路障已撤销，张星星一家的活动半径，仍局限在自家屋子和屋后的菜园里，“还是担心被传染，想尽量避免接触人。”张星星说。

“没上班的日子，大部分人估计都没啥收入”

“我们二三月份工资，只发了百分之三十，四月份怎么发还没个说法。”对杨晓来说，疫情对收入影响比较大，现在手上的钱已经不多。张义两个月没拿到工资了，“会按什么标准补发，现在都不知道呢。”据他了解，在私营小企业工作的人，收入都因为疫情大打折扣。

“没上班的日子，大部分人估计都没啥收入。”张义感叹。

从事少儿特长培训的石虎虎，武汉封城至今，没有一分钱进账。“再拖两个月，我们这个行业基本都得关门了。”

“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”石虎虎唏嘘不已。

经过层层审批，王晴川的小公司3月下旬迎来复工。开工那天，他给员工发了红包，补上了疫情期间的工资。

“我们在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，加了些补贴发放的”，谈起企业的财务状况，王晴川压力很大，“停产整整两个月，租金要付，工资要付，业务流失，目前相当困难”。

疫情期间，王晴川和妻子都染上了新冠，已先后治愈回家。“回来后，社区很关心我们，经常给我们送菜，有困难也会帮忙解决。”王晴川说。

身体逐渐恢复，生活上也有人关照，王晴川心中仍有些许担忧。按以往的习惯，他几乎天天都去办公。如今，尽管已拿到健康绿码，可还是在家办公。他担心员工介意自己得过新冠，更怕客户知道这事，影响接下来的生意。

这次，王晴川给所有员工投保了法定传染病险。“不管怎样，总算开工了。一切都在慢慢走上正轨。”

“即便疫情结束，也没办法回到从前了”

那些在疫情中失去至亲的人，很难走出疫情阴影，回归正常生活。

说起自己熟悉的伯父一家，田牧依很难受，“他们家四人感染，两人去世。即便疫情结束，也没办法回到从前了”。

伯父家有一儿一女，女儿与13岁的外孙女娇娇，跟他们老两口一起生活。一月下旬，女儿感染新冠，在家中去世。伯父、伯母和娇娇，也被传染上了。

当时武汉医疗资源特别紧张，一度求医无门。还好有亲戚帮忙在微薄发帖求助，引发关注，三人这才终于住进医院。

可惜伯父没能撑过去，一开始大家都瞒着伯母。田牧依说，可伯母一直没有伯父的消息，渐渐察觉出了不对劲，不停追问，最后不得不把实情告诉她。

伯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整个人崩溃了。她不停地给亲戚朋友打电话，有时要打七八个小时，并不停托人给伯父找最好的医生。

田牧依告诉记者，“她完全无法接受，伯父已经去世了”。

“虽然身体在逐渐康复，但精神遭受了严重创伤”，田牧依很担忧，“伯母已经出院，还在隔离中，不知道以后见到亲人，能不能恢复”。

娇娇也在隔离，“这孩子真可怜，小时候父母离婚，爸爸就不管她了。这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又失去了妈妈和外公。”田牧依心疼地说。

3月22日，娇娇更新了自己社交账号上的状态——“所有痛苦我一人扛，假装坚强……”，田牧依看到后很难受，“我们也没办法，她只能自己承受这一切”。

田牧依还忧心娇娇的未来，“本来，他们家庭收入主要靠伯父和娇娇妈妈。伯母的退休工资低，现在精神又不太正常，她将来的生活都很成问题”。

汉市民祭奠亲人。“看着这些人，真的特别心酸，武汉这段时间太难了。”邱沙不知道祭奠场景背后，有多少无法弥合的伤痛。

“候诊厅没人插队，没人喧哗，大家都在耐心等待”

4月4日这天，夏宇琪和朋友捧着鲜花，去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祭奠李文亮医生。“他去世的那晚，是最难受的时候。我和家人一人坐一个角落，默默地捧着手机流泪。”

中心医院门诊处在进行消杀，不能进入，夏宇琪和朋友绕了一个大圈，才找到献花的地方。“很多人在那里默默驻足，我们凭吊时也陆续有人加入。还有外地人在附近花店网购鲜花，托他们送过来。”

3月28日，吕晓宇去医院眼科门诊做检查，“在武汉住了这么多年，这是我体验到最融洽的医患关系。”

“候诊厅没人插队，没人喧哗，大家都在耐心等待，轻声说话，看完病都会说句谢谢”，在吕晓宇看来，这样的场景，跟他之前去过的所有三甲医院，都大不一样。

“真希望灾难中建立起来的相互体谅，能成为常态啊。”吕晓宇感叹。

三月中旬以来，武汉医院的普通门诊逐渐恢复。“说明医院新冠救治压力减轻，作为普通老百姓，听到这个消息很安心。”陈韧说。

“医院防护工作很到位，门诊医护人员都是‘全副武装’”，吕晓宇后来做了一个眼科小手术，术前，他还按要求进行了核酸排查。

“物理隔阂已开始打通，心理上的隔阂呢？”

4月6日，在武汉市江宁区新唐万科广场一楼大厅，苏一久久无法平静——一个尚未复工的糕点柜台里，标示牌上面写着“新鲜每一天。生产日期：2020年01月23日”。

糕点柜台的生意停留在1月23日，之后再没有开张。武汉这座有着上千万人口的城市，也在那一天切断所有对外交通，公交线路停止运营，小区逐渐封闭管理……

如今，武汉解封，这家糕点柜台何时能开张，他的经营者还好吗？

苏一不敢去想这些问题，一场疫情，已经改变了太多东西。

“珍惜生命，看淡名利。”聊起疫后心态上的变化，王晴川说了这8个字。

“父母过去很节俭，现在终于知道要吃好点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”张星星很欣慰。

现在的武汉，即使在相对拥挤的地方，人与人之间，也会下意识保持距离。

“人们的物理距离远了，心与心更近了。连陌生人之间，也能感觉到更多的体谅。”夏宇琪说。

夏宇琪对疫情结束后的生活是有信心的。“但我仍然担心，或明或暗歧视湖北人的现象”，她告诉记者，“反正我这一年是不会出湖北省了”。

“我们武汉人有这样的力量，让生活一步步恢复正常”，吕晓宇说，“更重要的是，其他地区能不能真正接纳我们。这是彻底走出疫情阴影的关键”。

“4月8号之后，武汉和其他地区的物理隔阂已经开始打通，人们心理上的隔阂呢？”吕晓宇很困惑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）